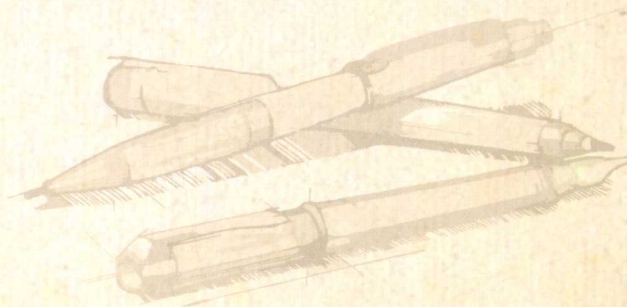


教育文化论纲

JIAOYU WENHUA LUN GANG

Outline of Educational
Culture

倪胜利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西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教育文化论纲

JIAOYU WENHUA LUN GANG

倪胜利◎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文化论纲/倪胜利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624-5923-1

I. ①教… II. ①倪… III. ①教育学:文化学 IV. ①G40-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708 号

教育文化论纲

倪胜利 著

策划编辑:唐启秀

责任编辑:唐启秀 叶霞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75 字数:348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923-1 定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对“教育文化”的研究,中外学者有很大差异。西方主要是谈“文化教育”,很少有像布鲁纳那样谈“教育文化”的。擅长整体性思维、惯于容纳混沌与不确定性的中国人,对“教育文化”这个概念表现了更高的热情。以“教育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和专著远比西方多。但是,人们在教育实际中使用的“教育文化”概念,与以理论形式表达的“教育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使用“教育文化”概念的语境和直觉大多都是正确的,然而一旦试图将之提升到理论层面,立即成为空洞和僵化的东西。列宁欣赏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列宁,1972)。法国哲学家昂立·柏格森相信直觉而贬抑理性(罗素,1997),其中耐人寻味的意义对思考文化的特性有一定的启示。能够用清晰的语言表达的文化概念,远远没有这个词语背后隐藏的意义丰富。人类社会的演进遵循着一种隐秩序,而“文化”这个概念无论在何处使用都指向这种隐秩序。

国内高校教育学专业开设“教育文化学”课程,从20世纪末已经开始,但是,使教育文化成为一门“学”的努力并未为学科建设奠定真正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现象难以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决定论与还原论在这里难以奏效,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教育文化,成为一个按照经典的科学范式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认识和解释方法。再者,文化概念本身具有较大的歧义性,由于认识视角不同而差异纷呈。即使在国内得到较多认同的文化概念,也很难拿来解释教育文化,一来由于它来自西方,从而与自身的文化土壤脱节;二来缺乏认识深度和统一的基础。然而很久以来,多数学者都是以西方人关于文化的定义为基础来认识和阐释教育文化的。这种解释使人关注于文化构成要素的静态分析,一种连续生成的、不断展开的本质的丰富性被忽略了。

这个论纲难免粗疏,但其首先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是尝试从一些全新的视角来认识和诠释文化,揭示“文化”这个词语背后深藏的意义。这些视角来自复杂理论、自组织理论、过程哲学和国学经典。最新的思想和最古老的观念相互印证,能够昭示一种跨越遥远时空的真理。从这些理论视野聚焦文化,一些不曾为人们深切关注并深入研究的本质特性便得以凸显,如文化过程的生命性、整体性、复杂性、过程性和自组织特性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整体的生命系统。也就是说,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文化系统都是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在与整体的关系中得以实现。从宏观来看,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其文化基因中都有其他文化的影响因素,不然它就很难延续到今天。一个文化系统可能已经存在几百年、几千年,但如果脱离与人类文化整体的联系,那些已经获得的形态也将由于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而趋于消亡。另外,各个层次上的文化过程,也都是相互关联的。微观层面的个

体文化过程,与各个层次的宏观过程是一致的。总体来看,文化生命与所有的有机生命系统一样,是一个形态发生的过程。“人文化成”是中国古代先哲对这个过程的经典解释,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就是这个“教育文化论纲”的逻辑主线。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努力,那就是在“通识”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什么是“通识”?当今大学里的通识教育,往往被通俗地理解为学文科的了解点自然科学知识,学理科的读点文史哲,用以扩大知识面。但实质上,在旧的学科框架中,这些不同的学科知识之间依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并不能使人形成统一地认识世界的知识结构。真正的“通识”是能够融通不同知识领域的见识,是能够统一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活的知识系统。打破学科壁垒的思想武器应从前沿理论中探寻。科学一直在向深度进军,只有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在最基本的层面形成通识。一般来说,科学越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越是趋向整合和统一。科学与人文,在什么样的认识深度上能够真正达到统一?这永远是最值得关注的话题。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追溯人类文化的起源,从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类文化研究的新视野等出发,阐述文化过程对人类形态发生的意义。

第一章至第三章梳理已有文化理论并提出新的文化观。对有影响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列举和评述,指出了其局限性和不足。新文化观的建构,试图在理论基础上有深度的挖掘和突破,因此提出了多维的认识视角和阐释方法,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概念起源的比较、华夏民族人文化成的历史溯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解读、文化系统的生命本质探讨、文化符号的基因功能分析、当代哲学和科学前沿理论视角的文化阐释等方面。世界文化思潮是人类文化发展整体过程的一部分,是教育文化的外部环境,它通过各种途径与教育文化发生关联,因此有必要去了解。

第四章至第八章是关于教育文化本质、过程、结构、功能的论述,是本论纲的主要部分。教育与文化作为共生系统,其形态发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的本质展开的最初状态,人的非特定性和复杂适应性是教育文化发生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从甲骨文和《易经》的交叉视角对“教”“育”“学”词源进行新的论证,从深层次上解释了教育与文化的渊源关系;认识教育文化基本范畴、对已有教育文化概念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以新文化观为根据解释教育文化,提出了教育文化新概念,揭示了以往不曾被关注到的教育文化本质特征;教育文化过程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文化系统中的成长;原理、过程方式及其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是论述的重点。大脑结构及其功能的最新研究为解释个体文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根据,教育文化结构分析主要涉及观念系统、组织结构、过程结构和作为过程之结果的创造物的结构。认识论与方法论探讨远比结构分析本身重要,结构主义、历时性与共时性、意识的宇宙、文化塑造的本体等理论,在教育文化阐释中都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参考价值。教育文化功能主要从三个方面认识:一是为个体文化生命生长创设生境,非特定性对文化适应的意义被予以充分的关注;二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教育文化的价值重构在当代凸显其重要性;三是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对这一过程的解释基于对生命原理的认识。

第九章至第十章对教育文化中两个较大的子系统进行论述。课程文化一章,依据新文化观认识和阐释课程文化的本质,其过程性、符号意义和深层结构是关注的核心;在课程文化的价值追求上,从真、善、美的角度对科学、人文、艺术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学校文化一章,将学校精神、校园文化、群体文化纳入一个相互关联、整体互动的关系之中来阐述,对学校文化的本质和认识论原理也作了重点讨论。

最后两章是关于教育文化冲突和教育文化新动向的思考与批判。第十一章主要论述文明的冲突,以及两种文化的冲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与教育文化发生关联并相互作用,教育文化系统内部各种冲突的本质及其整合的方法与策略等问题;最后一章是关于教育文化新动向的讨论,主要是通过资料分析来开拓思路,以期引发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本书可作大学本科以上专业课教材,也可作通识教育读本。对文化哲学和文化原理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能从中发现自己关心的话题。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的阐释	13
第一节 西方对文化的阐释	14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文化观	18
第三节 文化比较	23
第二章 文化新论	32
第一节 新文化观	32
第二节 文化生命	38
第三节 文化的存在方式	44
第三章 西方文化学派与当代世界文化思潮	49
第一节 西方文化学派	49
第二节 当代世界文化思潮	59
第四章 教育与文化的渊源	72
第一节 教育与文化关系探赜索隐	72
第二节 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词源考证	77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的演进	81
第五章 教育文化观	85
第一节 教育文化认识论基本范畴	85
第二节 教育文化解读	90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本质特征	97
第六章 教育文化过程	103
第一节 教育文化过程实质	103
第二节 教育文化过程原理	106
第三节 教育文化过程的基本方式	110
第四节 教育文化过程的主要特点	119
第七章 教育文化结构	122
第一节 理论与方法	123

第二节	结构分析	129
第三节	意义阐释	135
第八章	教育文化功能	144
第一节	教育文化与个体发展	145
第二节	教育文化与社会	150
第三节	文化传承与创新	156
第四节	教育文化的复制功能	161
第九章	课程文化	167
第一节	什么是课程文化	167
第二节	课程文化的结构	171
第三节	课程文化核心价值系统	178
第十章	学校文化	194
第一节	学校文化的内涵	194
第二节	学校精神	200
第三节	校园的文化	203
第四节	学校制度文化	208
第五节	群体文化	210
第六节	学校文化的认识论原理	222
第十一章	教育文化冲突	225
第一节	文化冲突的本质	225
第二节	“两种文化”的冲突	233
第三节	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冲突	238
第四节	教育文化主体间的冲突	241
第五节	冲突与整合	243
第十二章	教育文化新动向	247
第一节	孔子学院	248
第二节	小留学生	251
第三节	考研热	256
第四节	弃考现象	259
第五节	蚁族	261
参考文献		268

绪 论



大自然造物,又总是不断在摧毁它。拉兹洛(Laszlo)说人是地球上升起的那个等级结构的一个微型构件,这个等级结构是自然损毁各处以构筑一处这种发展趋势造成的结果(欧文·拉洛兹,1985)。从大自然中涌现出来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结构,体现着一种永恒的秩序。

地球生命有近40亿年的历史,人类是地球生命中涌现出来的最为精密和复杂的系统。它负载着以往岁月的沧桑巨变,在不断的毁灭和再生之中日趋完美。人类的基因就如海洋的沉积层,积淀了自诞生以来所有的生命信息。正因为这最为长久的历史,人类才成为人类。但是,人类依然不完善,面对未来无限的时空,人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从而才会获得适应性。人的世界能否与自然共存,有赖于对成就人类生命的自然本质的认识,有赖于人对自身的理解。

一、认识人类

人类是从大自然中衍化出的智慧生命,是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物。千百年来人类对自身的追问从未终止过。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说人对人的认识并不会影响到人的存在(兰德曼,2006)。他将这样一种见识视作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人若不能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就会导致生存方式与自然相悖,从而走上难以逆转的毁灭道路。在技术理性支配一切的时代,斯芬克司^①之谜依然具有隐喻意义:人类的童年是四足着地的动物,成年是肢体获得解放从而具有支配力量

^① 希腊神话中带翅膀的狮身人面女妖。传说她常令过路行人猜谜:什么动物早晨用四只脚,中午用两只脚,晚上用三只脚走路?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后因被俄狄浦斯道破谜底是人而自杀。谜底是:人早年用四肢在地上爬行,成年用两腿走路,晚年借助拐杖走路。

的霸主,晚年是离不开工具的行将就木的老者。人类从肉体的遗传素质到意识能力的进化过程,将因技术的运用而为不可挽回的萎缩与退化所代替,以至人造物成为人类生命须臾不可离开的依赖性资源。这种结局中潜藏着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危机。人类应当从一个经典的神谕中汲取生存的智慧:“人啊,要认识你自己”。^①中国也有一句古代经典:“圣人之大宝曰位”,人之贵,就在于明白自己在天地时空中的位置。

人类反观自身的意识能力归根结底来自自然的本性。恩格斯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②这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人对自身的认识从根本上就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既有意识就会有肯定与否定的价值选择。在人类的大脑结构中有决定脑神经细胞连接与断开的价值系统,大自然的价值系统则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在摧毁与建构此消彼长的永恒运动中,大自然保存了它自身的创造物。

人类世界受神经意识的引导,从其所产生的源头日渐分化出来,只有沿着原环节返回最初的形态才能找寻到发展的踪迹。人类今天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是地球生命进化的暂时状态。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人与地球上其他物种一样,从一个共同的起源发展而来。从形态发生来看,任何系统发育的初始点,都是一种未分化的混沌状态,其后的演化进程,在经历了无数接连不断的分岔点之后,差异被逐渐放大。人类的现状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千百年来不断被追问的话题,只能在文化的解读中寻找答案。人类的历史也是文化史。人类从大自然中走出,自然塑造了人类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影响自然,使其成为人化的世界。这种异化的趋势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复杂化。

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与其原初发展阶段已经大为不同。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从肉体、心理到精神意识方面都在被技术所重塑。迈克尔·波伦(M. Pollan)在《植物的欲望》一书中有一段描述,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技术是如何实现对人的控制的:

麦当劳的炸薯条的确漂亮,金黄色的细长矩形,长得超出了装炸薯条的红纸包,蓬蓬松松地簇拥着,令人顿生食欲。我不太爱吃,看着同去的这位同学用金黄色的薯条蘸着红色的番茄酱,慢条斯理地嚼咬着,一边吃一边转转手中的薯条,打量欣赏、细细品味,我心中暗想到,这就是孟山都和麦当劳这类大公司所欢迎的顾客了。它们开发、培养和强化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的欲望又成为这些公司天文数

① 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也赫然铭刻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当时“最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用这句话来教育人们,后来甚至被奉为阿波罗神谕。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字般商业利润的支撑。对于麦当劳这样的全球性连锁企业来说,必然要选定一个品种才能达到它那种工业化的标准,炸得这样长、这样完美。全球性的单一种植,培育着一种全球性的欲望,而全球性的单一种植现在又依赖于像基因工程这样的技术。(迈克尔·波伦,2005)

诸如此类的事例充斥着现代人类生活。譬如,我们的体质由于长久生活在恒温的环境中而使适应性萎缩、对交通工具的依赖导致肢体的退化、由于基因食品的吸收而逐渐使我们难以适应自然秩序、药物的滥用导致免疫系统丧失、农药的运用导致生态退化,还有,人类为了自身的安逸而对大自然造成的种种破坏等。人类这个因文化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系统,有可能正趋于一种封闭的极限环。哲学家们早已对“技术的陷阱”有充分的警示,但它似乎依然停留于哲人的忧思,那种与自然相适应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难以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欲达到“化民成俗”,尚有许多艰难的建构。我们将希望与努力倾注于教育文化。人类的未来,就决定于文化的导向。

二、关于人类起源研究的新思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在智人阶段因了不起的一跃而脱离了动物的人类,以其优越的智慧创造出技术、语言、社会、文化等,现在人们看到的是自然、社会、智慧、技术、语言和文化在一个几百万年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智人。如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所说:每个人有生日,而人类没有生日(埃德加·莫兰,1999)。

地球生命演化有几十亿年,而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不过几百万年。在人与动物的分岔点上,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突出事件成为最重要的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1978)将石头这种自然的存在物变成主体的生存工具,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是通过一些文化的遗存了解了人类从动物走出的那个最初的时刻,这些遗存主要是以工具的制造为标志。以至于我们说,人类的形成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创造了人类。但这与“文化为人类所特有”的观点并不是一码事。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文化是人与动物相区分的重要标志。这种认识使我们把文化与自然的本质相对立。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也就是把自然驱逐出人类社会,这种观点需要在当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他还提出了另一个论断:“没有一只猿手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由“劳动创造了人”或“文化创造了人”可以推出的合理结论是:“劳动”和“文化”是先于人的存在。达尔文早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文中指

出:从感性知觉、记忆、模仿、注意力、情绪、想象、审美、学习、预言、推理直到使用和制造工具方面,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本质差别。制造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1959年5月17日,利基(L. Leakey)在坦桑尼亚的Olduvai Gorge发现的“东非人”,是一种介于猿与人之间的动物,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00万年,它能直立行走,且骨骼周围有用砾石制成的小型工具。它可以用来说明: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最近的研究证明这一能力在现代类人猿中几乎普遍具有。其中黑猩猩表现得最为出色。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出:猿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进化成了人类。猿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提高到了人的水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许多具体问题的阐释,也需要在人类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一般原则的阐述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还有关于动物能够使用工具的论述:“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雨。它们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

关于动物“制造工具”的事实,最著名的是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对黑猩猩的研究,以下资料取自一些观察记录:

记录一:……我很快蹲下,并举起了望远镜。这是白胡子大卫,一只成年雄猩猩。它正坐在蚁穴旁边,专心致志地从宽叶的长剑草上掐下叶茎。我望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卫正把一根细茎插入蚁穴,并守候在那里。它从蚁穴里钓出了一些东西舔食着。当叶茎折断以后,大卫又捡起了一根有点像葡萄枝的茎,捋去叶子,咬断比较细的一端,又重新干了起来。我观察了整整一个小时,大卫不时移动位置,在对每个蚁穴试探过以后,它扔掉草茎,走了。

不仅猩猩,禁猎区的其他动物也食白蚁。狒狒、其他低等猿猴以及鸟类也会扑捉昆虫。但是,只有猩猩才能利用极简单的工具,猎取蚂蚁。

记录二:有一天,雨果和我在林中远远看到,年轻艾维莱德(一只黑猩猩的名字)从树枝上摘下一把叶,把它塞到嘴里,慢慢地嚼了一会儿,然后吐出来,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放到一个树洞中。当艾维莱德把它掏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嚼烂的树叶上挂满了水珠。艾维莱德从自制的“海绵”上吮吸水分,又把它塞入“水桶”,继续吸着。上述情况表明,猩猩能够改变物体,使之达到自己的目的,表现出它利用物体作为工具的某种能力。(郑开琦,等,1982)

动物还能制造更为复杂的工具,只是关于动物能否制造“工具的工具”,尚未

有足够的证据。恩格斯所说的“最粗笨的石刀”就是这类工具。木质的工具可能早于石器,能用石器来砍削木棒应是更高阶段的事情。但就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来看,所谓人和动物的界线,确实很难判然分明。这不仅是表现在工具的制造方面,还有我们称为“文化”的许多其他特征,也早已在动物阶段就开始具有。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一书中曾经谈到,非口语的自我表现也是文化的形式之一,它在动物中也存在。人们只要见过澳大利亚北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伯格鸟的优美婚礼舞蹈,海豚的可爱游戏或者野马的优雅奔腾,就不会怀疑这种自我表达中也包含着文化。它甚至比遵循逻辑程序宣读的论文更接近人类的艺术(埃里克·詹奇,1992)。意识既然是自然的产物,它就不仅仅只限于人类。拉兹洛在《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一书中指出:可以肯定,你的狗和我的狗都有意识。它感到疼痛、饥饿和渴,还有交配的欲望;它能感受到快乐和悲哀,因为一般来说,它是有内心活动的。可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意识不但可以指具有感觉能力,而且还可以指体验到自己具有感觉的能力(欧文·拉兹洛,1985)。当然,后面这种关于意识的认识及其表述,有点元认识的意味了,这应该是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能力,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否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个疑问。

总之,认为自我意识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的阶段的产物,这只是在恩格斯的时代能够搜集到的证据所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是自然的,然而人们对经典的误读将会导致谬见的产生。

三、时空的微小扰动与人猿的巨大涨落

人与动物同源,都在不断进化。但为什么灵长类中只有一支进化成了人类,而其他的种类却停留在原来的状态或缓慢地进化着?

考察人类发展的历史使我们了解到,人类是在死亡与迁徙的大涨落中不断完善起来的物种。摧毁与建构并存的大自然,成就了适应动态变化的种类。在自然界诸多物种中注定能够成为“人”的这种生命系统,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和境遇,这种特点就是,在系统个体的构造上具有极大的不完善性和非特定性,并能通过与环境的交流互动进行整合性的重构。环境的变迁为这种适应性变化提供了条件。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到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热带的某个地方,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他用一些直觉的形象描绘了这些猿类是如何完成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的。法国古人类学家科庞(Yves Coppens)以“东边的故事”为题描绘了这种发展的模式:

学术界一般将人科分为南方古猿属、能人属、直立人属和智人属。南方古猿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南方古猿脑子扩大,并逐渐获得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从而向人属的方向转化的呢?

1500万年前的非洲,从西到东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灵长类动物,其中包括很多种类的猴子和古猿。可是在随后的几百万年里,那里的环

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生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时,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一线裂开。结果,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像起泡那样地上升,形成了海拔270米以上的高地。这些高大的隆起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地貌,也改变了非洲的气候。它破坏了以前从西到东一贯的气流,使东部成为少雨的地区,丧失了森林生存的条件。连续的森林开始断裂成一片片的小树林,形成片林、疏林和灌木丛。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这里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峡谷。大峡谷的存在造成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峡谷东西两侧动物群交流的屏障;二是进一步促进了镶嵌型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的专家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和猿的分支进化是极为重要的——使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分成两部分。大峡谷西部的群体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最终成为现代的非洲猿类。而大峡谷东部的群体,为了适应开阔环境中的生活,发展了一套全新的技能(两足直立行走、解放上肢、开始使用和制造工具),从而经过南方古猿向人属方向转化。^①

由这个故事所描述的情景,我们对人类起源及其文化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天地系统的微小扰动,会引起生物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在灭亡与迁徙中,一些物种产生并发展起来。人类最早的足迹发现于因气候变化而干旱起来的东非。要么是这些灵长类离开了树木,要么是树木离开了它们,人类进化的步伐于是在森林和草原的边缘地带展开。这个分岔点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节点。于是人类的产生以环境的灾难、遗传的变异和社会的分裂作为序曲(埃德加·莫兰,1999)。人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演化过程,受自然界摧毁与建构的根本法则所支配和控制。没有恐龙的灭绝就没有哺乳动物的繁荣,没有生存环境的巨变就没有走向人类的猿群。在生命系统的发育过程中,大小强弱的变化中隐藏着大自然最为深邃的秘密和惊人的奥妙。

人类不同于其他灵长类的进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人与动物的分化。动物在接近10亿年的漫长时期中是仅仅通过突变和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而从猿进入到人类,是短短的1400万年的瞬息时刻发生的事情,这个时间显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猿类的大脑进化出了非遗传性的继承和演变系统,开始有了我们今天称为“学习”的行为模式。这实际上是一些灵长类普遍具有的习得性行为,人类早期这种习得性行为越来越多,并且由一些有意识的传递活动加以强化。原人进化过程是遗传、环境、大脑、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形态发展过程。狩猎活动与游戏中孕育了原初形态的文化。动物的游戏,常常是以狩猎为主题,成年动物与幼年动物之间的嬉戏,实质是一些生存策略的信

^① 资料来源:刘武《寻找人类祖先的足迹:南方古猿》, <http://www.ghzx.com.cn/geren/cansai/x030205.htm>。

息传递过程。专心、顽强、好斗、勇敢、狡猾、施诡计、设陷阱、下埋伏等技巧的传递与训练,可看作教育的最初形态,其手段的运用与大脑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些活动在构建人类的大脑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哪些猿群使用的伎俩多,大脑结构也就越复杂,而那些体质弱小的比那些强大的更多使用计谋。正是在以弱小对付强大这样一些事件上我们更多地观察到动物的“智慧”。

有科学家观察到,野生的灵长目动物经常会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同胞布一些迷惑阵,而它们这一恶行的发生频率直接与其大脑皮层的平均大小相关。例如,一种非洲产的丛猴和狐猴大脑皮层体积较小,所以它们的行为也相对“怯懦”。而那些经常在邻居和同胞之间耍花花肠子的猕猴和大型猿猴(如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则拥有相对较发达的大脑皮层。灵长类动物将自己的“智慧”用于相互欺骗及满足个体利益之中,这种策略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本能,衔鸟装作受伤来吸引捕猎者并将之引离雏鸟,这种骗术在许多动物甚至不那么高等的动物中很常见。灵长类只是更为复杂和多样化,而在走向人类的这一支,习得性行为及其我们所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得到突出的发展,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动因。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人类进化的速度并不均匀,而是以很高的加速度演进,人类的大脑因日益发达而走上发展的高速路。

四、是什么成就了人类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不远的几百年前,地球上各大陆还布满了原野和森林,如今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几何形状和尺寸安排得井井有条,即使是空地,看上去也是规划过的,到处都有技术留下的痕迹。现代文明延展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以至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尚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土地、海洋、山川、河流。追思更为遥远的情景,大约到了一万年前的时候,就回到了满目洪荒的时代。那时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十分弱小。中国古代典籍记述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五蠹》)英国历史学家沃辛顿·史密斯所著《原始野蛮人》一书中提到原始人常被说成是捕捉巨大的猛犸、熊和狮的猎人,但是野蛮人曾经猎获过比鼠、兔更大的动物的可能性是极少的。人多半是猎物而不是猎人(郝·乔·韦尔斯,2001)。可以想象得到,一些高度发展的灵长类,也难免种群灭绝的命运(如北京人、尼安德特人等),而人类是如何从岌岌可危的生死边缘攀升到今日之世界霸主地位的呢?

就我们目前已有的知识,人类是如何发展的,只能在劳动与文化的过程中寻找答案。但问题在于,劳动作为生存的前提,对所有动物来说都必不可少。马克思早先提到,蜜蜂的劳动和人类建筑师劳动最大的不同,是后者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为前者所不具备。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动物的劳动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识。至于文化,如前面所提到的证据,其源头也都延伸到了动物。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大约涉及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这些在动物世界都能找到雏形。看来,使人成为

人的原因绝非某种单纯因素所能说明的,人类的出现是大自然的一种涌现,劳动和文化可以将许多现象之间建立起意义关联,但这似乎也不是全部。人类这个种群所遇到的特殊的机遇与自身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因素。关于外部条件和机遇,就是“东边的故事”所描述的环境变化,而内部条件,由遗传物质所积累的信息及其大脑结构的变化可能成为最显著的因素。

脑量增加是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些重要的数据如下:生活在距今 600 ~ 700 万年前的托麦人,其脑量与黑猩猩接近;距今 440 ~ 15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其颅容量为 400 ~ 530 毫升;距今 250 ~ 160 万年前的能人,颅容量为 510 ~ 752 毫升;距今 170 ~ 20 余万年前的直立人,颅容量为 600 ~ 1 251 毫升,平均为 1 050 毫升左右;距今 20 ~ 10 余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颅容量为 1 100 ~ 1 500 毫升;距今 10 ~ 3 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发现,颅容量为 1 300 ~ 1 750 毫升。我国更新世晚期智人山顶洞人的颅容量为 1 300 ~ 1 500 毫升,柳江人的颅容量为 1 400 毫升。人类脑量增加是新结构形成所造成的,而新结构是处理信息的场所,符号化功能与之密切相关。

在人从动物刚刚走出的数百万年时间里,新大脑皮层的进化速度与其他灵长类差距不是很大,只是在最近的几十万年中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其中,符号系统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恩斯特·卡西尔,1985)。

最初的人类显然是关注到那些带有某种规律性而重复出现的事物,它们在大脑的相关区域引起固定的感觉与反应。初始状态的人类会把感觉经验中重复出现的构型固定下来,使它们成为跟共同构型一致的感觉集束,然后用符号表示这些不变性。语言和工具都属于发展较早的符号系统。比如一个最简单的石头工具,它能派什么用场,其中就有对于它的普遍性的认识。即使是一块用来投掷的工具,也可能被一用再用,这种行为模式导致对以往行为效果的记忆。那些更为复杂一些的工具就更具有符号的意义。我们还可以推测诸如仪式、敬畏、族群首领地位的固有的表达方式等,它们都具有符号的意义。而对大脑结构的改变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是语言系统的发展。拉兹洛指出:语言可能是在长达五十万年这样一段时期内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它从像动物用以进行信息交流的那类表情达意的姿态和叫声开始,进化成有含义的符号,而这正是现代语言的典型特点。表情达意的姿态和叫声可以造成一种刺激,表示出在信息交流者所处环境范围内的某种直接的意义,但符号却能够包含有完全不受此时此地这种条件限制的含义。某些鸟类的舞蹈,作为交配仪式的一部分,表示此时此地它已作好交配的准备,而一首情歌却能一般地谈到情爱交流及随之发生的感受,或者谈到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地方发生的这种事。因此,采用表义符号而不采用表情达意姿态和叫声的人类语言,成了

交流信息的有效手段。它使人不仅能在他的周围的世界生存下去,而且能支配这个世界。由于共同使用一种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在大家都理解的一套语义维系着的范围内,存在变成了社会存在。文化诞生了,社会组织的精细复杂的形式创造出来了,人成了社会文化动物(欧文·拉兹洛,1985)。的确,一些动物在用表情达意的肢体传递信息方面比人类有更多的优势,如漂亮的羽毛、优美的舞姿、婉转的歌喉、华丽的毛发、雄健体魄的展演等,依靠这些,它们可以在特定的环境稳定地生存下来,而人类没有这些优势,只有发展对话的器官,但恰恰是这种符号系统被其后的演化史证明,对促进人类大脑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由此看来,说“劳动创造了人”“文化创造了人”是有足够的证据的,这是必要条件但似乎还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劳动”和“文化”并没有使其他动物发展到人这样的水平。脑的进化中积累的生命信息、人类特殊的境遇以及许多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人类的涌现。人类起源问题中蕴藏着我们永远解不出的大自然的奥秘。人类为自身理性所限制,身处特定的时空关系之中,对于多维的宇宙缺乏洞见是自然的。人类已有的理性让我们看到的是它能够让我们看到的,在它的解释力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当我们提到“涌现”这个概念时,它所涉及的是一种自组织的宇宙观,建立在科学研究前沿理论基础之上的新的宇宙观,是我们研究教育文化的理论基础。

五、几种有影响的观点

在认识人类进化的问题上,有几种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进化视为受“自然选择”原理支配的同样的过程,排除了其他解释和将人类进化与其他生物进化相区别的可能性。但人类的进化显然不能完全用被动的“适应”来解释。人类从动物时代已具雏形后又得到发展的许多能力显然迥异于动物,如抽象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性、道德性、爱与意志,甚至包括在精神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对宗教和意义的追求等,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难以解释的。

社会学家在解释社会进化问题时对达尔文思想的依赖,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本质上却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滥用。他们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同其他自然有机体变化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规律,都是一种对于环境的适应过程,社会在一种“功能性适应”的类遗传机制下,逐渐分化为彼此独立却紧密联系、依赖的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地接受了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关于“基因遗传”是获取能力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但它却忽视了特定社会中权利结构对于能力分布的影响,也忽视了社会主体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习得的能力,以及由某种共生合作产生的能力提升。他们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单纯地视为一个“无意识演化的过程”,社会主体不过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的受体,社会主体竞争在原初形